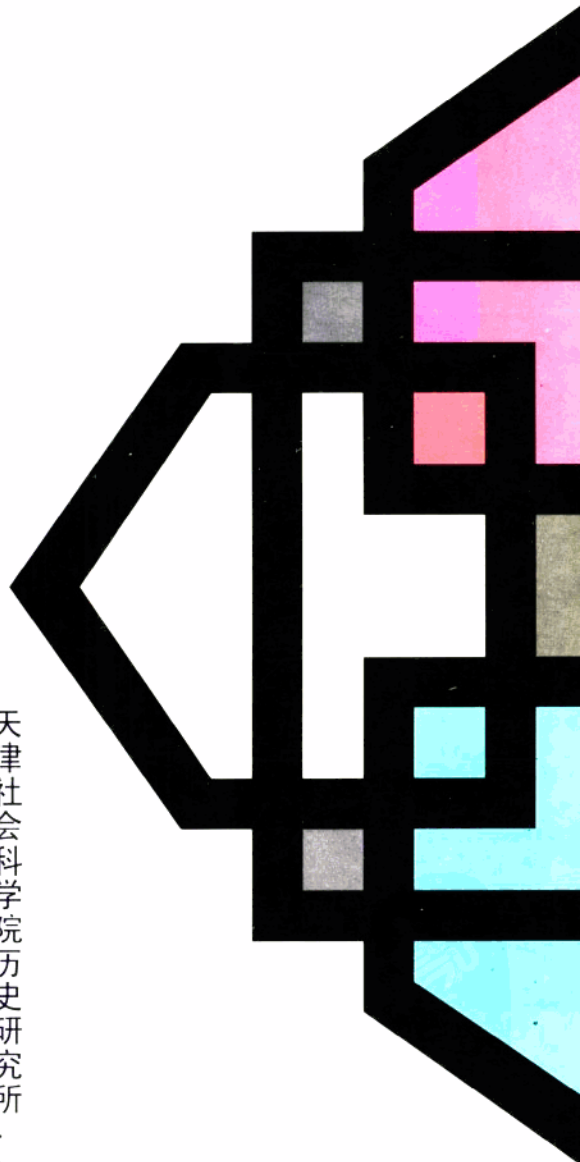


城市史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天津市城市科学研究会 合编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第 15 - 16 辑



编 委 会

顾 问 王 辉 刘玉麟

编 委 (按姓氏比划为序)

万新平 王明浩 冯承柏

刘洪奎 沈玉麟 林纯业

罗澍伟

编 辑 部

主 编 胡光明 刘洪奎

执行主编 刘海岩

编 辑 周俊旗 任云兰 余朗丽

上海研究

上海:一个移民城市

..... 裴宜理著,李红英、汪远忠译,池子华校(1)

上海与横滨的开埠和都市形成 郑祖安(19)

清代前期的沿海贸易与上海的崛起 许 檀(45)

城市文化

社会转型与中国城市文化的近代化 涂文学(62)

民国时期新文化在华北城市的发展 周俊旗(78)

天津租界和老城区:近代化进程中的文化互动

..... 刘海岩(100)

漫话天津人口与天津文化——天津历史的一个剖面

..... 罗澍伟(119)

天津金融街的建筑文化 赵 津(131)

古代城市

论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于云汉(139)

城市近代化

卫生与城市现代性:1900—1928 年的天津

..... 罗笑芸著,作舟译(150)

试论京奉铁路与天津城市的发展 吴弘明(180)

城市经济

北洋时期天津商会的组织系统 宋美云(195)

20 世纪初金融风潮与天津钱庄 林地煥(207)

书评

近代中国城市的多维性——评《天津租界社会研究》

- 罗澍伟(225)
- 研究古老都城近代化的开拓之作——评《走向近代
化的北京城——城市建设与社会变革》..... 魏开肇(230)
- 民国城市生活的历史画卷——由一套丛书谈及城市社
会史研究..... 李 为(238)

国外中国城市史研究通讯

研究述评

- 关于旧上海的论题：一个既可比又不可比的城市
..... 华志建著，任云兰译(244)
- 日本中国城市史研究与评析 贵志俊彦著，汪寿松译(262)
- 日本的中国工人运动史研究
..... 高纲博文著，王尧译，冯承柏校(279)
- 经济与文化认同——殖民地香港的商业与政治
..... 蔡荣芳著，贾锡萍译(285)

会议综述

- 东亚城市中的外国人侨居地..... 朱迪丝·威曼著，肖佳译(289)
- 中美城市规划与保护 司昆仑著，曾 函译(293)
- 中国民间建筑..... 罗纳尔德·纳普著，宋文峰译(295)

英文书评

- 中国的边疆城市 马润潮著，袁红丽译(298)
- 广州之旅 迈克钱著，袁红丽译(302)
- 文学和电影中的中国城市
..... 斯特凡妮·唐纳德著，曾 函译(306)

URBAN HISTORY RESEARCH

Number 15-16, 1998

CONTENTS

Shanghai Study

- Shanghai: an Immigration City
..... Elizabeth Perry, Translated by Chi
Zihua, Li Hongying and Wang Yuanzhong(1)
The Opening and Urban Formation in Shanghai and
Yokohama Zheng Zu'an(19)
Coastal Trade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Shanghai Xu Tan(45)

Urban Culture

-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Cultural Modernization
in Chinese Cities Tu Wenxue(62)
The Development of New Culture in Cities of North
China in the Republic Period Zhou Junqi(78)
Tianjin Concessions and Old Chinese City:
the Cultural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 Liu Haiyan(100)
Random Talk on Population & Culture: A Section
of Tianjin History Luo Shuwei(119)
Architectural Culture of the Financial Street in Tianjin
..... Zhao Jin(131)

Chinese Ancient City

- On the First Upsurge of Ancient Urban Development
in China Yu Yunhan(139)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Cities

- Hygienic Modernity in Tianjin, 1900-1928
..... Ruth Rogaski, Translated by Zuo Zhou(150)
The Jingfeng Railroad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ianjin
..... Wu Hongming(180)

Urban Economy

- Organizational System of Tianjin Chamber of
Commerce in Beiyang Period Song Meiyun(195)
Financial Crisis and Tianjin Qian Zhuang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Yim, Chi Hwan(207)

Book Reviews

- Multidimensionality of Modern Chinese Cities:
Comments on Research on Tianjin Concession Society
..... Luo Shuwei(225)
An Exploring Study on Modernization of an Old
Capital: Review of Beijing Transforms: Urba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Wei Kaizhao(230)
A Historical Picture Scroll of Urban Life in the
Republic China: A Series of Books and Research of
Urban Social History Li Wei(238)

Overseas News of Chinese Urban History

Summaries

- Theses on Old Shanghai: A City That Both Defies and

Invites Comparison

...Jeffrey N. Wasserstrom, Translated by Ren Yunlan(244)

Japanese Research on Chinese Urban History:

the Analysis & Review

..... Toshihiko Kishi, Translated by Wang Shousong(262)

Japanese Research on Chinese Labor History

..... Takatsuna Hirofumi,

Translated by Feng Chengbo and Wang Yao(279)

Economics & Identity; Business & Politics in Colonial

Hong Kong

..... Jung-Fang Tsai, Translated by Jia Xiping(285)

Conference Reports

Foreign Communities in East Asian Cities

..... Judith Wyman, Translated by Xiao Jia(289)

Urban Planning & Conservation in China & in

the United States

..... Kristin Stapleton, Translated by Zeng Han(293)

Chinese Vernacular Architecture

..... Ronald G. Knapp, Translated by Song Wenfeng(295)

Reviews for English Book

Chinese Cities at the Edge; Urban Form on the Frontier

..... Laurence J. C. Ma, Translated by Yuan Hongli(298)

A Tour of Guangzhou

..... Michael Tsin, Translated by Yuan Hongli(302)

The Chinese City in Literature and Film

..... Stephanie Donald, Translated by Zeng Han(306)

上海：一个移民城市

裴宜理著 李红英、汪远忠译 池子华校

按语：裴宜理教授以研究近现代中国群众运动和基层政治而著称，自 80 年代以来发表了大量学术专著和论文，其中许多以中国城市或专以上海为研究对象。本文译自作者 1992 年出版的学术专著《上海的罢工：中国的工人政治》(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 的第一章。该书是专门研究中国工人政治的，曾荣获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现代东亚优秀书奖，并被国际工人史学会评为“年度最佳书籍”。作者以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为个案，全面探讨了 20 世纪前期中国工人政治的状况，并与欧美工人政治做了比较。作者指出，上海工人按籍贯、性别和技术水平分类，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工人多有差异。由于这些差异，中国的工人不是联合为一个统一的劳工阶级，而是形成了互相分隔、彼此竞争的一个个团体。而这种分化又产生了系统、悠久的团结，这种团结鼓励了行动主义。因此作者认为，分化实际上是增强而不是削弱了中国工人的力量。该书大量采用了工人访问、工厂和政府档案、警察报告以及回忆录等第一手资料。在研究方法上，将着眼于工人文化和基层经济环境的“新劳工史”与注重罢工、工会和政党的传统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全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追溯了上海工人力量的地理和文化渊源，说明籍贯不同的劳工反抗的

差异;第二部分通过叙述 20 世纪 20—40 年代的工人运动,说明外来组织者是如何被迫接受工人们原来的传统的;第三部分通过对烟草、纺织和运输业的具体研究,揭示了不同行业的工人们在生产过程中是如何对当时的政治事务作出反应的。本书是两卷本研究中的第一卷,第二卷将探寻工人运动和近代中国政权形成及变革的关系。

近代上海的迅速发展是与其作为通商口岸的地位分不开的。鸦片战争(1839—1842 年)的后果之一是开放对外贸易和允许外国人在华居住,这使得上海在几十年间由一个繁华的国内港口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大都市。上海位于长江和黄埔江交汇处,靠近中国的主要蚕丝和茶叶产区,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它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商业中心。在开放通商的短短几年中,上海的进出口额就占了中国总进出口额的大部分。^①

这种国际性贸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新的英租界(1863 年与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这些“国中之国”位于上海旧城以北,不久,就成为成千上万外国居民的庇护所,其建筑体现了欧洲建筑风格,显示出与原有华人居住地不同的另一王国。旧城(其城墙是 16 世纪中期为抵御倭寇而修建)的建设适应于国内贸易的需要。这里,木屋小店面对着弯弯曲曲的街道,街道的名字告诉人们能在那儿找到什么产品:咸瓜街出售腌肉和水果,豆市街上卖各种豆类和谷物,竹子巷里可买到木材和竹子。^②

^① 郑祖安:《近代上海都市的形成》,《上海史研究》(上海,1984 年),第 172—173 页。关于近代上海的形成的各种观点见唐振常:《上海史》(上海,1989 年);刘惠吾:《近代上海史》(上海,1985 年);墨菲(Rhoads Murphey):《上海——近代中国的钥匙》(马萨诸塞州,剑桥);波特(F. L. Hawkes Pott):《上海简史》(上海,1928 年);兰宁(G. Lanning)和柯林(S. Couling):《上海史》(上海,1921 年)。

^② 朱梦华:《上海南市旧话》,《上海地方史资料》,1982 年第 1 期,第 42—47 页。

与之比较，在外国人居住区，富丽堂皇的西式办公楼、房屋、教堂、跑马场、花园和俱乐部鳞次栉比，为日益增多的侨民团体提供工作、居住、宗教和娱乐的场所。完全由外国人组成的政府——包括工部局、法庭和巡捕——很快地建成以保护外商的利益。

一本地方志描绘了 19 世纪晚期上海的城市情景：

观察上海之一角确实就像观滴水而知沧海。虹口区的迪斯尼路、蓬路和吴淞路满布日本人，就像身处日本；北四川路、武昌路、崇明路和天同路满布广州人，就像到了广东；霞飞路西段满是法国人开的商店，就像置身于法国，小东门外的洋货商店大部分由福建人经营，就像在福建一样；南市的咸瓜街全是由宁波人开的商店，如同是在宁波；外国人和来自中国各省的华人都聚集于此，因此把上海看作整个世界的缩影是毫不夸张的。^①

商业在上海的早期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不久工业投资就取而代之了。原有的外国公司和新兴的国内企业竞相生产棉丝纺织品、烟草、机器和其他商品，上海因此而闻名。1861 年第一家蒸汽缫丝厂（英国人拥有）建立，四年之后著名的江南制造局（中国拥有）成立。到 1911 年，所有的中国企业——包括外国人的和中国人的，有四分之一以上设在上海。到了 1933 年，这一比例上升到将近一半。到 1949 年共产党接管前夕，足有 60% 的民族企业集中在上海。^② 工业的发展导致上海城市人口，尤其是工人阶级人数的急剧增加。城市人口从 1852 年的只有 50 万发展到 1949 年

^① 胡祥翰：《上海小志》（上海，1930 年），第 10 章。

^② 金汉升：《上海在近代中国工业化中的地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29 期（1985 年），第 461—462 页。

的 500 万。^①

构成上海劳动力阶层的劳工来自中国各地。因此近代上海一直是一个移民城市。1885 年,非上海籍人占上海华人总数的 85%;1950 年,这一数字为 84.9%。尽管移民持续不断,但是不同移民团体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宁波的移民超过了广州的移民,而来自江苏及更北的其他省份的移民又超过了宁波移民。

广州移民

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上海的移民绝大部分来自广州地区。多年以来,作为中国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广州产生了适合外国商业需求的大量劳动力。当广州因为上海的开埠而地位下降的时候,数以万计的广州人——大部分是水手和轮船制造商——流往北方新的工商业中心以便施展他们的技能。这一移民浪潮在 1843 年进一步加剧,因为在这一年讲洋泾浜英语的广州籍买办吴健彰被任命为上海的署理道台。他最初是作为爽官(行商)而为外国人所知,他居住在虹口区,便于接受他的英美朋友们的保护。^②到 19 世纪 50 年代早期,成千上万吴健彰的同乡来到上海,大多数住在虹口区靠近吴道台的地方,或沿广东路靠近主要船坞的地区,这一地区蜂拥而起的大量广州餐馆反映出这一地区新居民的烹调嗜好。^③

这些广州籍移民,像随之而来的其他移民一样,不断建立一些

^① 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1980年),第90—91页。

^② 费正清:《中国沿海地区的商业和外交》(马萨诸塞州,剑桥,1953年),第394—396页。

^③ 梁元桑(Leung Yuen Sang):《19世纪中期上海的地区冲突》,《城市问题》,1982年第8期,第30页;吴祖德:《酒楼饭馆一瞥》,《革命史资料》,1987年第5期,第146—151页。

同乡公所或分馆以便在这个不熟悉的城市环境中保护他们自己。^① 这种机构一方面可为新来者介绍职业，另一方面又可在其困难之际提供救济帮助。规模较大的会馆或公所建有寺庙供奉当地比较常见的神，搭建舞台用来上演地方戏，开设学堂以教育儿童和培养学徒，经营存款和贷款业务，另外还建有墓地。^②

中国的学者有时候倾向于把同乡会的产生看作是在华人中普遍存在的“独特”的宗教性的一种表现，而这种宗教性在广东人中表现尤为突出。然而，这样的组织也曾在世界其他移民有意保持与当地居民不同的生活习性的地区出现过。比如在美国，移民工人协会也是按种族和地域的区别来组织的。在1914年，单在纽约城就有同乡者组成的500多个慈善团体。“每一个慈善团体都（通过来自他们村庄的雇主）向同乡提供工作机会、保险津贴、医疗补助、无息贷款和墓地使用权。”^③

无论是在纽约还是在上海，同乡会都使离乡的工人感到一种归属感。移民团体不仅是工作和福利的源泉，也是在完全不同的环境中确立自我的一种方法。鉴于此，宗教仪式和公共节日就成为大多数会所或公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团体精神就是通过无数次这样的活动产生，这种活动有助于在移民中间形成独特的集体行动模式。

早在1853—1855年，上海就目睹了同乡会在小刀会起义中不可遏制的力量。^④ 尽管这一事件被证明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具有

① 一个有用的上海主要会馆表见《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1980年），第507—513页。关于广东会馆的传统见爱德华·罗兹（Edward J. Rhoads），《中国的共和革命：广东个案，1895—1913》（马萨诸塞州，剑桥，1975年），第24—25页。

② 吴肇编：《上海县续志》（上海，1918年），第3章，第2—8页；《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上海，1984），第58页。

③ 詹姆斯·格林（James R. Green），《工人世界》（纽约，1980），第28页。

④ 以下关于小刀会起义的论述主要选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编写的《上海小刀会史料汇编》（上海，1980），详细的引证和进一步的论述见笔者的《晚清的抗税运动：上海的小刀会和山东的刘德培》，《晚期的中华帝国》，1985年第1期，第83—112页。一个有趣的解释是把小刀会当作工人运动，参见王尔敏的《五口通商初期上海地区群乱事件所反映的秘密会社之生机》，《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1981年第12期，第65—90页。

深远的影响(比如:小刀会占领上海 17 个月,外国人因此感觉受了侮辱便接管了海关),但是它的起因很普通。小刀会的领导者是一个会讲洋泾浜英语、抽大烟的三合会的广州籍人,他与吴健彰来自同一个村庄,起义的主要参加者来自广东各会馆(联合了福建会馆)。

到 19 世纪中期,出入上海的帆船已达 3500 艘,它们吸引着大约 8 万广东人和 5 万福建人来到这个货物集散地。鸦片战争后,许多旧式中国船在与外国轮船的竞争中被淘汰,致使那些新失业的水手随时准备起来反抗。当地运输业的收缩同样使一些会馆领导人的财产蒙受损失,也使他们像失业人员一样加入到了反抗的行列之中。

小刀会的主要战斗力量是一群性质繁杂的失业水手,主要来自广东和福建,由各自本籍的公所或会馆的领导人组织。这些会馆或公所的领导人不仅是上海通商口岸社会的重要成员,而且还因充当远道而来的同乡的赞助人而成为当地的领袖。李少卿,广东嘉应会馆的领导人,小刀会起义早期的重要首领,曾是长江三角洲一带广东籍鸦片走私者的保护人。鸦片非法贸易是把上海地区反清的城乡秘密会社联系在一起的关键因素。吴道台来自嘉应县,很早就以官员的身份支持会馆创办团练。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团练为以后的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以会馆为基础的团练加入集体暴动是广州人的一种存在已久的行为,不久前的三元里抗英运动就是一个见证。^①

1853 年 9 月 7 日,起义者几小时内占领了拥有 20 万人口的上海旧城。上海知县刚从祭祀孔子诞辰纪念会回到衙门正要换上礼服时,遭到了起义者的突然袭击,被刺死在衙门里。刺客原来是

^① 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大门口的陌生人》(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1966),第 1—3 章;陈明高(Ming Kou Chan):《珠江三角洲的民众动员和劳工反抗:1831—1927》,提交亚洲研究协会 1989 年年会论文。

吴道台团练的一个重要首领，几个月前因煽动暴乱被上海知县投入监狱几个月。吴道台也被起义者绑架，但很快迫于美国当局的压力而被移交给他们。小刀会在占领上海过程中遭到的唯一抵抗来自吴道台雇佣来作保镖的一支 40 名士兵组成的卫队。但是他们中除了 17 人外其他都拒绝为之卖命，因为他们是三合会的成员。

同乡会形成了起义最初的组织，但它不会长期发生效用。起义者内部意见分歧，这在占领上海县城后很快趋于明朗，在分配衙门财产时福建帮和广东帮产生了争端。福建帮成员把他们分得的战利品装上帆船便以分道扬镳相要挟，主张杀死吴健彰，然后带着抢得的财物回到南方老家去。广东帮更具野心，他们以小刀会最高统帅的名义通知美国当局，假如吴健彰对新的小刀会政府宣誓效忠，广东人将使其官复原职，然后起义者将马上向苏州进发以便占领这座江苏省省会。不幸的是，美国当局释放了吴健彰，随后，他在清王朝镇压小刀会起义中发挥了作用。

尽管小刀会起义最后毁于不断升级的内部争吵以及清王朝的镇压，但是它作为一个窗口向人们展示了上海这个通商口岸社会的复杂性。在上海开埠通商允许外国人居住不到十年里，有迹象表明多年以后才形成的集体行动的模式已初见端倪。外国人、政府官员、地方实力派及其领导下的工人阶级之间复杂的要互作用，给犯罪和叛乱提供了永久的温床。匪徒和叛乱者充斥于这个混合的环境。通常，这些人物在主要的政治运动中携起手来以领导那些不满的或失业的工人，有时这些运动具有强烈的民族色彩。但是，这些反抗的声势无论多么浩大，他们仍不能完全摆脱籍贯的影响。

宁波移民

这一时期，矛头指向清王朝的武装反抗不止小刀会一个。在

它的西部,太平军建立了太平天国,他们定都南京,并且派军队占领了江南的大部分地区。^① 1861 年春天,太平军占领了通商口岸宁波。^② 惊慌失措的地主和商人,不愿看到他们的财产被农民叛乱者没收,蜂拥而至上海寻求庇护。这群浙江(主要来自宁波)贵族的流入为著名的甬帮(即宁波帮)注入了新生力量。甬帮已统治上海金融界几十年。^③ 新进入的财富部分投资于新式工业企业,部分投资于传统手工业,如珠宝业、木工业。这些手工业生产的奢侈品用来满足上层社会生活方式的需要。在上海市场上,因得益于有八个多世纪以来对外贸易的经验和他们的家乡靠近上海,宁波商人很快超过了他的竞争对手——广州人。

经济竞争因文化差异而更加激烈。19 世纪 70 年代,祖籍宁波的作者在上海地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极力称赞宁波“高雅”的风俗习惯。与此相对照,这些文章中以一个广州妓女的形象为例说明她的家乡——广州的粗鄙。这一系列文章触怒了广东籍人,愤怒的信件纷纷投来。^④

文化差异从居住方式上反映出来。广东人聚居在已美国化的虹口区。宁波移民居住在靠近宁绍渡口的南市的上海旧城区,这一渡口是联系上海和浙江省的贸易生命线。这里环境优雅的茶馆迎合着他们的口味。由于茶馆颇受人们的欢迎,它的数量从 1912 年的 64 家迅速发展到了 1919 年的 164 家。坐在这里,人们可以一边品着杭州著名的龙井茶一边欣赏着越剧或苏州评弹。一些茶馆

① 太平军占领南京使大批熟练技术工人从南京逃往上海避难,如细木匠、纺织行会的会员和其他有教养的难民等,见《北华捷报》1856 年 8 月 30 日,11 月 15 日,1857 年 5 月 16 日。

② 简又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纽黑文,1973),第 19 章。

③ 苏珊·曼(Susan Mann Jones):《宁波帮和上海的金融实力》,《两个世界之间的中国城市》,伊瑟可(Mark Elvin)和施坚雅主编(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1974 年)第 73-96 页。

④ 梁元桑:《19 世纪中期上海的地区冲突》,第 40 页;《申报》(台北重印),第 7 卷,第 4161、4170、4217、4242、4265 号。英国的报纸也客观地描述了广东人,谴责了他们在 19 世纪 60 年代中期的错误行动中的“粗俗”行径,参见《北华捷报》,1865 年 3 月 25 日。

还出售艺术品、占卜算卦，并为那些玩鸟行家提供比试的场所。另外，茶馆还是调解纠纷的中心，争执的各方在指定的调停人的调解下同意吃“讲茶”。当争执双方都对解决办法感到满意时，他们就喝一杯用红茶和绿茶混合泡制的茶水作为重新和好的象征。^①

散落在这些茶馆中间的是大量的会馆，在那儿同籍的商人和劳工聚集一起共同分担经济和社会事务。^② 这些会馆使宁波移民的“强烈的地域观”成为一种习俗。最典型的是宁波移民之间称呼他们自己为“阿拉同乡者”，最明显的例证是宁波的雇主把雇工的优先权首先给予他们的亲戚，然后依次是来自同镇或同村的人，同县的人，最后是来自宁波地区其他地方的同乡。^③

上海主要的宁波人会馆——四明公所，1797年建于旧城北门的外面。在随后的几年里，随着宁波社区的扩大，四明公所的财力也急剧膨胀。1844年，当原籍宁波的上海知县宣布四明公所成为一个免税机构时，它的特权地位得到了承认。尽管四明公所于十年后毁于小刀会和清军的战火，但是，它很快以更加富丽堂皇的样式重新建立起来。新的公所包括寄柩所、义冢、议事厅、钱庄、客房和供奉土地神和关帝的祠庙。每年一度祭祀两神的仪式把居留上海的各个阶层的宁波人聚拢到一起。^④

法租界在其邻近地区建立后，势力强大的四明公所也面临着严峻的困境。法国人宣称公所的灵堂和墓地危害着公共健康。1874年，他们决定通过建造一条直穿公所基地的马路来扩大其租界的控制范围。作为回应，1500多宁波人在四明公所集会进行抵抗。在这次冲突中，7名公所成员被杀，引起了一声复仇骚动。在

① 余谦(Yu Qian):《春风得意楼及其他》，《上海掌故》(上海，1982)，第65-68页；钱化佛：《三十年来之上海》(上海，1947)，第23-24页。

② 关于浙江会馆和同乡会的传统，见基恩·肖帕(R. Keith Schoppa):《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变革：20世纪初期的浙江省》(马萨诸塞州，剑桥，1982年)，第27-31页。

③ 斯波义信：《宁波和它的腹地》，《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施坚雅主编(加州，斯坦福，1977年)，第437页。

④ 《上海研究资料》(二)(上海，1937年)，第295-296页。

这场骚动中,许多法国人的房屋和商店被付之一炬。尽管宁波公所的永久使用权在1878年条约中被确立,但20年后,法国领事再次宣称他的政府打算占领这一有争议的地区。当法国军队出发去拆除墓地围墙的时候,宁波会众团结起来共同反抗,法国人雇佣的宁波籍工人离开工厂,宁波居民拒绝购买洋货和为他们提供的服务,就这样经过六个月的斗争,宁波人取得了胜利。这一胜利证明了地缘乡谊的政治能量,这一反抗斗争也经常被冠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爱国主义罢工。^① 宁波社区对外国人觊觎其墓地的富于战斗性的回应是中国文化中以葬仪为中心的反映。^② 就像一位博学的外国居民对这一事件的评价:“对于只渴望有用之物的西方人来说,中国人因不愿搬迁墓地而阻止一条马路的修筑似乎是荒谬可笑的。但对中国人来说,外国人好象不尊重死者,而对死者的尊崇是中国文化中最重要的一部分。”^③ 无论是有身份的人还是普通人都同样把葬礼过程看成神圣的,而葬礼过程的地区差异是种族差异的一个重要标志。由于目标指向了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地产,法国当局激起了宁波民众强烈的愤怒,没有任何问题比此更能有效地促进当地一种新兴政治力量的活跃。

江苏——华北移民

近代上海的第三次移民浪潮来自江苏和其他更北的省份。这一浪潮开始于19世纪60年代,一直持续到20世纪。这些移民是太平天国战争和自然灾害的难民,其中包括一些富有的江南地主(尤其是来自无锡和苏州的地主),但是,大多数是来自苏北、山东、

① 琼斯(Jones):《宁波帮》,第86-88页;方腾(Fang Teng):《虞洽卿论》,《杂志月刊》1943年第12卷,第2-4期,第59-63页;《甬光初记》(上海,1941年)。

② 詹姆斯·沃森(James L. Watson)和罗斯基(Evelyn S. Rawski):《晚清帝国的葬礼》(加州,伯克利,1988年)。

③ 波特:《上海简史》第98页。